

文化人类学

陈啟新 署

论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论集

陈启南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论集

陈启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灵山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1印张 插页1 244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720册

ISBN 7-219-01502-X /G·381 定价：3.70元

目 录

序.....	(1)
论民族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	(3)
中国民族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和理论建设.....	(22)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与周邻民族的融合和发展.....	(40)
氏族起源初探.....	(61)
血缘家庭之我见.....	(83)
从表亲婚遗俗看普那路亚家庭.....	(102)
也谈纳西族的母系“衣杜”和易洛魁人的“奥华契拉”	(121)
略论拉祜族的母权制及其向父权制的过渡.....	(137)
论家庭公社诸问题.....	(154)
论拉祜族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	(170)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	(189)
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研究.....	(211)
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的几个基本观点	
——为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	
一百周年而作.....	(233)
乳源必背瑶山多种经营的调查与研究.....	(255)
关于原始人文身的几个问题.....	(269)
也谈乳源瑶族服饰上的刺绣图案.....	(286)
试论民俗学中的民俗分类.....	(305)
试论民俗学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316)
我国民族丧葬习俗的源流和改革刍议.....	(326)
后记.....	(344)

CONTENTS

- Preface by Liang Zhaotao (1)
On the Object, Content, Method and Task of Ethnology (3)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Chinese Ethnology in Application and Theory (22)
On the Formation, Fusion with Adjacent National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Han Nationality (40)
A Tentative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Clan (61)
My Views on Consanguineous Family (83)
A View of Punaluan Family from Cross-Cousin Marriage (102)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Matrilineal "Yi Du" of the Na Xi and the "Ovachira" of the Iroquois (121)
The Transition from Matriarchy to Patriarchy in the National Minority of Lahu (137)
On Various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Kinship Commune (154)
The Emergence of Monogamy in the La-hu People, Yunnan Province (170)
A Tentative Opinion on the Caus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of Li Nationality	(189)
Research for the Division Problem by Stages in the Primitive Social History	(211)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be Maintained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y	
—For the Centen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on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State" by Engels	(233)
A Study of the Diversified Economy of the Yao People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Bibei, Ruyuan County	(255)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attoo of Primitive Man	(269)
On the Embroidering Pattern of Clothes of Yao Nationality in Ruyuan County	(286)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lkways in Folklore	(305)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Function of Folklore i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316)
A Humble Opinion o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Reformation of Burial Practice of Varied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326)
Postscript	(344)

序

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两个最大分科。前者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后者则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从而构成一门既具有综合性又具有明确范围与独自特点的科学人类学。直至今天，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独立学科了。

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产生于欧洲，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在我国它还是一门年轻的人文科学。诚然，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比较多，主要如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若以各分支而论，则在我国也有其各自的良好传统与丰硕成果，但是，就整体而言，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利用综合性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化的实用性科学，则可谓起步未远，或称方兴未艾。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内容丰富，多姿多采。可见，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天地。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可以为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政策措施提供事实和理论依据，并培训各种文化事业的专门人才，具有辉煌的前景。在开放改革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偏见，努力发展我国文化人类学，使之成为研究中华文化的决策性学科，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基于这一宗旨，中山大学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于一九八一年成立了人类学系，开办考古学和民族学本科两个专业，设置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与这两大分科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课程，面向全国招生。与此同时，设立了文化人类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招收以民族考古为方向的文化人类学博士研究

上和硕士研究生，并成立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六年多来，我系全体教师在人类学教学和科研中均获可喜成绩。“管中窥豹，足见一斑”，陈启新同志这本论文集，就是我系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陈启新同志于六十年代初在中山大学专攻原始社会史、考古学、民族学，曾参加过本校组织的滇西原始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毕业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多年的民族研究。一九七八年调回中山大学后，先后任教于历史系和人类学系，主讲《中国民族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等基础、专业课程，并经常带领学生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有丰富的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经验。这个集子的论文不乏教学中答疑解难、学术上切磋争鸣之作，但相当一部分就是利用他参与直接调查的材料写成的，因此，无不给人以新鲜、深刻的印象。

集中包括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学和民俗学两个学科的内容，涉及到民族学理论、民族形成、民族经济、原始社会形态、婚姻家庭、民族风俗习惯等诸方面的探讨。材料翔实，论点鲜明，阐释有据，其中关于原始社会史的论述，自成体系，对不少问题的考察都有自己的见地，尤见其独辟蹊径的功底。

令人欣喜的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虽因种种缘故，在我国历经坎坷，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得到国家的重视，且愈来愈赢得人们的普遍关注，开始踏上新的发展途程。陈启新同志这本论文集，无疑是我国文化人类学百花园里的一枝，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我们应该加以培土、浇灌和扶持，使其健康成长，以期文化人类学的鲜花硕果满树满园。是余负疴命笔，欣然为序，以寄殷殷之望，并对广西人民出版社扶植新枝之热忱，深表敬佩。

梁钊韬 1987年国庆节

论民族学的对象、内容、 方法和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研究 古今一切民族的科学

民族学一词最早是来源于希腊文“*Σ ονος*”和“*γραφω*”，译成中文，含有“民族”和“描写”之意，合起来就是民族情况的记述。这种记述世界上一些国家很早以来就有了，但这仅仅是以民族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而已，不能称之为民族学，更不应象苏联某些学者那样将其中享有盛名的作者誉为什么“民族学之父”。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民族学自古有之。其实，民族学作为一门有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的学科的出现，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情。这门学科传到我国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民族学，顾名思义是一门以民族为其研究对象的科学；换言之，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已由它的名称作了规定。然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民族学在不同的国家，不但名称不一样，而且研究对象也不相同。在操英语的国家，这门学科被归入人类学的一个部门，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其研究对象，过去只限于本国以外国家（殖民地）的所谓“原始民族”或“土著民族”。欧洲的一些国家，则称研

究本国民族或所谓民间知识的学科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而把对外国民族、殖民地民族或落后民族的研究叫民族学。还有把民俗学等同于民族学的，如德国的 *Volkskunde*（英语 *folklore*）杂志的内容就包括了民族学。解放前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后改为《民俗》季刊），亦包括了民族学的内容，等等。由于国内外对这门学科的名称和内容的不一致，加以各家翻译的不同，所以中文的译名五花八门，既有人译作“人种学”、“人文学”；又有人译为“民俗学”、“民族志”或“民族志学”；也有人译作“土俗学”、“土俗志”和“人种志”等等。我们认为，*Ethnology*一词，译作“民族学”是确切的。民族学与民俗学亦应有所区别，后者应该是前者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以“民族学”作为中译名称，也是随着学科的发展，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才逐渐统一起来的。但民族学中的一些术语（例如俄文的 *НАРОДНОСТЬ*），至今仍无确切的译名，致使这门学科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①。

西方民族学把研究对象局限在“原始民族”范围内，是有其原因的。因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直接相联系。当西方学者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学者尾随殖民地官员，踏上非洲、美洲、澳洲和太平洋诸岛，与那里因自然和历史条件而滞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或带有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接触时，对于他们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以及房屋、服饰、习俗、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仪式等等，一句话，即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和自己民

①我们认为“*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中文不宜直译为部族，而应意译作古代民族，以区别于近现代民族，不然就会给民族学带来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混乱。若以部族一词指称今天一些民族，不但不妥当，而且还会引起强烈的反对。

族大不相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因而引起极大的惊讶和“兴趣”。为了了解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以便掠夺他们的财富、土地，进而征服和统治他们，于是便开展对这些“原始民族”的调查与研究，逐渐形成以“原始民族”为研究对象、以“史前社会”为中心的西方进化论民族学。在进化学派中，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成就最大，他不但研究了“史前社会”，而且还探讨了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在这一点上，与摩尔根同时代的西方学者是无法企及的。

十九世纪末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反进化论的学派，如德、奥的“传播论学派”，美国的“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英国的“功能学派”等等。这些派别有些声称自己的研究是为本国的殖民政策服务的，有些则以纯学术的外衣为掩护，实质上是宣扬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以反对认为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着客观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民族学这门科学，对一些著名的西方民族学者（尤其进化论者）的著作都进行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种。他们通过对西方民族学的批判继承，从而形成了以世界古今民族为对象、以研究社会形态（即社会经济形态）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其代表作就是恩格斯执行马克思遗言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培养了大

批民族学干部，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学机构，出版了许多民族学杂志和专著；高等院校也开设了民族学课程，学术界对民族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和任务等问题曾开展争论（这种争论迄今尚未结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综观苏联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在研究对象方面虽已越出了西方民族学只以“原始民族”为对象的范围，而曾含糊地主张过研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但在研究内容方面却没有跳出西方民族学划定的民族文化与生活习俗的框框。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以古今所有民族为对象的科学。这点，只要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起源、发展和变化的学说，便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原始社会解体而逐步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共同体仍不断地发展变化，大都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则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了古代民族（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近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由于自然和历史等原因，一些民族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并没有依次经历过以上诸社会形态的发展，而越过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社会形态，进入奴隶制或越过奴隶制进入封建制都是有可能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无产阶级革命在多民族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其中一些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的民族，甚至可以越过其他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在追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民族的起源时，还常常需要涉及到一些与之有关的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的研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古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极其明显区别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古今一切民族的科学，故它有着广阔的前景。那种把研究对象囿于“原始民族”的西方民族学，必然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原始民族的消失而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不能不为其研究对象发生危机而慨叹不已：“这是从我们的前辈起，很早就已开始的担忧。甚至在十九世纪初期，最早成立的那些以土著民族为调查研究对象的学会，就已经有过这种担心，认为这种无文字民族，正处于日渐消失的景况，感到能够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消失的速度快得出乎意料。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到五十年以后，仍然保持典型特征，可以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了”^①。为了挽救这种危机，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把研究对象逐步转向对“阶级社会的研究”或作“综合性研究”。说明西方民族学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学术动向，对此，我们应仔细地加以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中心内容 是社会形态的研究

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内容，苏联民族学家在《苏联大百科全书》“民族学”（ЭТНОГРАФИЯ）条中认为是各民族的

^① [法]列维—斯特劳斯：《民族学者的责任》，《民族译丛》1979年第4期，第37页。

文化和社会习俗^①。他们所说的文化，一般是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最近，为了为苏联国内的民族“一体化”政策服务，又有的学者提出研究“民族过程”^②。苏联学者的前一种主张，对我国民族学界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的痕迹，至今仍能看得出来。我们认为，从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著名的民族学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体系来看，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形态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中心内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有必要把这部著作产生的背景和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在马克思的《摘要》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所论述的问题却又大大超出了它的范围，而成为一部有科学体系的民族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在写《摘要》时，已经打破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顺序，将该书列为重点的包括十五章篇幅的第二编——“政府观念的发展”放在最后，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除摘录《古代社会》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材料以外，还研读了其他西方进化论者的原始社会史论著，对这些著作的主要观点均作了简短有力的评述；对正确的加以肯定，对错误或论述不周的地方则予以指出，并补充自己掌握的材料，以充实各方面的论证。

恩格斯在《起源》中还补充了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资

①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Ы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Т. 49, СТР. 249—256.

② Ю. В. 勃罗姆列伊、В. И. 科兹洛夫，《民族过程是一项研究课题》，《民族译丛》1979年第2期，第32—33页。

料，扩大论述范围；不但周密地剖析了原始社会，而且还详尽地解剖了其他社会形态。因此，不能把《起源》误解为一部“史前社会史”的专著。

恩格斯在《起源》中，用大量的生动的民族学材料，通过对氏族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具体过程的剖析，阐述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原始社会史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恩格斯并没有局限于原始社会形态的论述，他还在“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和“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五章中，探讨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三种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三种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并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精辟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中所论述的问题，已大大超出了原始社会史的范围，而详尽地深刻地解剖了其他四种社会形态。因此，《起源》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五种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民族学巨著。这部以各民族社会形态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当时世界任何一种民族学著作都无可比拟的。当然，恩格斯在剖析各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同时，还论述了诸如经济类型、土地所有制、宗教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等民族学的内容。然而，恩格斯在作这些方面的分析时，总是把内容置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进行，因为这些内容离开了所属的社会形态，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如果科学地把这些内容归入所属的一定的社会形态中，按照它们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探究，那么，

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由此可见，社会形态研究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始终的一根红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别于任何西方民族学的标识。苏联民族学并没有这个标识，我们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应该鲜明地树起这个标识。其实，也只有以社会形态作为中心内容，才能使民族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研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因为，推动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动力，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民族学工作者在探讨民族的社会形态时，就必然首先要对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加以分析研究。

解放后，我国民族学工作者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已初步弄清了解放前除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其中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有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独龙、布朗、怒、傈僳、德昂、阿昌、景颇、拉祜、纳西、黎、佤、基诺等十五个民族；保留奴隶社会形态的有四川云南大小凉山的彝族；保存封建农奴制的有西藏的藏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新疆夏河洛克乡的维吾尔族等，西藏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大体处于这个发展阶段；其余各族则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有的还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踏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恰恰构成了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各种社会形态异常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可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原理，为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我国民族学应有的贡献。

为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民族学还得借助其他方面的知识。这就牵涉到民族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诸如，在探讨各族历史上长期混血的关系及其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骨架的体

质关系时，必须借助体质人类学；在探讨某一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和起源问题时，便需要利用考古学资料加以证明；在进行民族识别，及探讨在语言上反映的历史关系时，就得借助语言学的知识，方能确定彼此之间具有语言亲属的民族共同体，以及这些民族关系的历史线索；当使用上层建筑资料以论证一个民族的社会性质或婚姻家庭形态等问题时，就必须利用民间的口头创作——歌谣、史诗、故事、神话、传说等民俗学的知识；在对某些民族作人口统计、社会问题调查或地理分布的研究时，就离不开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知识，等等。当然，这些学科在探讨有关问题时，也常常需要从民族学这一活的“社会化石”的材料中得到启示和旁证。这就是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辩证关系。

三、现状和历史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是从现状入手然后追溯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精深的论述：

“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深思和科学分析，一般说来，总是按照与现实发展相反的道路进行。那总是从后面，从发展过程的完结开始”^①。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8页。